

《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

王 蒙

读《三国演义》还是小时候的事。近日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些同名电视剧的片段，产生了一些胡思乱想：

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么？什么英雄？争权夺利，好勇斗狠，尔虞我诈，就是英雄么？刮骨疗毒，拔矢啖睛，一不怕疼二不怕死就是英雄么？这疼与死又所为何来呢？他们关心的唯一热点无非是争夺权力，特别是争夺那唯一的一把龙椅罢了。为了争龙椅，不惜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不惜决堤放水，乘风放火，不惜生灵涂炭，啼饥号寒……这么多英雄怎么没有一个人替老百姓说一句话呢？

刘备火烧新野，带了一些老百姓避难樊城，就大仁大义到了近乎迂腐的程度了。可如果他不搞什么火攻，老百姓又哪里有这种流离失所星夜逃亡之苦？

个别地看，英雄事迹不无感人之处，例如击鼓骂曹，例如孤胆英雄赵子龙长坂坡救主子的儿子；但综观全局和历史，这样的乱世英雄愈多，老百姓就愈没有好日子过，生产力就愈不发展，社会就愈不进步。中国已经吃够了这种争王位的英雄们的亏！

赶巧前不久看了电影《西楚霸王》，对于巩俐、张丰毅等主演的这部片子的商业性改头换面及其得失这里暂且不表。问题是秦皇出巡时刘邦与项羽的反应：“大丈夫当如是”也好，“彼可取而代之”也好，都透露了中国的有为之士以做皇帝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以官阶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的可怕与可悲。价值标准的一元化贫乏化俗鄙化，价值=权力的公式，使终极目标千篇一律都成了“取皇帝之位而代之”。欲代之的“英雄”甚多，而皇帝的位置只有一个，如何能不争不斗不杀它个尸横遍野白骨如山？价值标准的单一化看来似是天下定于“一”了，有利于统一与稳定，但需知，“一”能定天下，也能乱天下，有了“一”就有了一切，便都来争这个“一”了，焉能不乱？政治=权力=升官图；而

最高的价值=一切有为之士的终极目标=“龙位”，这个等式实是中国数千年来战乱不断，发展缓慢，而终于在近百年显出了积弱来，即是说搞出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许，对于“三国”时期的英雄们来说，老百姓是太没有意义了。三国时期的英雄们，其实是拿老百姓当垫脚石当工具当牺牲品的英雄。这样的英雄今天难道还算英雄么？我们能够无条件地接受“三国”的英雄观念么？

那个时候的政治呢？当然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这种政治的特点，一个是砍脑壳政治，一会儿就提溜一个一秒钟前的活人的脑袋进来，并以此为勇为豪气为人生最大快事。一个是阴谋政治，就是不断地使计谋。而计谋的核心在于欺骗，说谎，谁善于欺骗谁就胜利而且获得智多星的美名，谁相信了——轻信了别人谁就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这种心理暗示实在太可怕了。

三国里的计谋也有趣。例如王允巧(?)使的所谓连环计，使计的一方如此卑劣而又一厢情愿，堪称愚而诈，小儿科而又不择手段。用如此下作的方法去做一件似乎是伟大的事业——忠君报国；就是说汉朝的社稷要靠色情间谍来维持。这未免可悲可耻。这种伟大事业的伟大性与正义性也随之可疑起来。

而被使计的一方，即董卓与吕布，居然一步一步全部彻底不打折扣地按照王允布下的圈套走，按照一个年方二八(周岁只不过十五)的小女子的指挥棒跳舞，说一不二，比校场操练还听话还准确；这能够令人相信么？如果说董吕两个人也曾经掌握权柄，赫赫一时，能是这样彻头彻尾的白痴么？何进中计一节也是一样地匪夷所思，如弱智傻瓜，如韩少功写的“爸爸爸”然。

如果吾国一个未接受过职业的色情间谍训练的十五岁的小女子在一千几百年前就能胜任这样一个极端狡猾极端残酷极端非人性的角色，这是多么地不祥呀！我们这个民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这种权力政治的第三个特点是叛徒的政治。整个三国演义电视剧的第一部分叫做什么“群雄逐鹿”的，就是一部叛卖史。吃谁的饭砸谁的锅的吕布，没有好下场，不但快了人心，也体现了“三国”对于叛徒

政治的否定。但是，以我们的头号英雄人物刘备来说，据说关羽张飞诸葛亮对于他都是忠而又忠义而又义的了，他对于谁忠义过呢？他投靠过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然后又都叛变了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与例如所谓反复无常的吕布，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这也透露了封建政治的悖论。一方面要忠要义，一方面又有什么“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叛变有理论。哪样对呢？全看“活学活用”了。

一些三国故事，颇有浓厚的黑社会黑手党故事意味。上来就是“桃园三结义”，典型的黑社会做法和黑手党语言：“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副盗匪的亡命气。电视剧里张飞的形象尤其可笑复可憎，一副匪气霸气蠢气，恶声恶气，昏头昏脑，蛮不讲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大哥”如奴婢鹰犬，对他人如阎王虎狼，谁需要这样的“三弟”呢？只能是黑社会的大哥大。他给人们的视觉观感甚至还不如《沙家浜》里的胡传魁。

当然，《三国演义》并不是历史，而是民间的历史传说，它反映的是吾国百姓草民们对于历史的观点，包括“误读”与趣味性通俗性“重写”。但是想一想，吾国百姓们对于天下大事、历史沿革，特别是政治军事斗争包括对于英雄主义的解读竟曾经是如此简单化、俗鄙化、小儿科化、赤裸裸地野蛮与霸道化，这不能不给人以怵目惊心之感。

也许《三国演义》的故事里要把刘备树成一个仁义之主，王道而非霸道的化身，然而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按现在表现的，刘关张之属，实在与曹、孙、袁乃至何进、董卓等没有什么质的差别。

也许在封建社会王道云云只是说一说的，而实际上，人们只承认霸道的力量。霸道当然是有力量的，这力量却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了限度，就会走向反面。这种国内政治的霸权主义，很实用实惠，但又不无危险的，弄不好它会流于愚昧短见的野蛮主义蒙昧主义。它是令我泱泱文明古国早期灿烂而后来停滞的一个原因。思之令人害臊叹息。

《三国演义》电视剧下了很大功夫，制片态度不可谓不严肃，但收视效果似不理想。除了某些观念上的愚昧野蛮令今人感到格格不入以

外，我认为电视剧反映了作品本身的一些不足。人物的类型化与事件的简单化就是其中要者。由于《三国演义》所述故事繁复纷纭而又千奇百怪，“三国”人物是又多又杂，似乎是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写到了，故而总体看来，“三国”的阅读效果堪称是相当成功的，人们的一般印象是“三国”写得丰富多采，琳琅满目。但这种丰富多采琳琅满目的效果是粗线条的，一往屏幕上立，类型化小儿科化的毛病就显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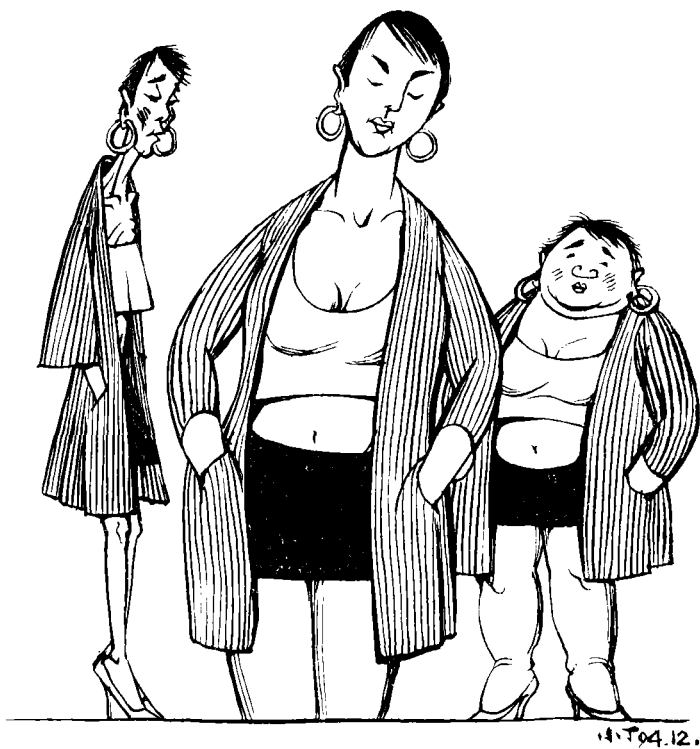
我想起了一位可敬的领导同志常举的例子来了，他多次说过：“谁说恋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三国演义》就没有写恋爱嘛，还不是一样写得栩栩如生？”

活人少而类型多，当然用不着爱情。但是不要轻视类型的生命力，愈是类型愈容易理解接受和普及，成为“典型”，成为“共名”。成了典型共名了也还是暴露出了类型化的缺憾，这个问题似乎值得深思。

我草此小文的目的当然不是要以张飞的态度对《三国演义》这一古典文学名著搞一次砍杀，不是对于“三国”的全面评价，也不是——基本上不是对于同名电视剧的批评。电视剧里的某些情节处理得还是很妙的，例如袁绍兵败后派眼线搜集所部的言谈话语，有非议者立即杖责或处死，这么一干更是军心大乱，袁绍之子鉴于此，乃诛杀专门挑拨是非的打小报告的眼线。这段故事可圈可点，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但我也从同名电视剧上看到了一些值得反省的东西，值得重视的东西——用金克木先生的名言叫做“前现代”的东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们的学问家热衷于“后现代”已经很久了。中国这么大，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中国的发展变化日益与世界同步，因而中国这里也有了超豪华超奢侈的后现代，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毕竟这里多得多得多的是前现代——离现代化还远去了呢。不论从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身上还是从各位餐馆老板祭供的关老爷身上，或者是从电影屏幕上看个没完没了的这个帝那个妃上（张中行先生在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文学自由谈》上对此有一精彩评论，读之大快），我都觉得我们应该比关注后现代还要严重地关切前现代。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首《西江月》列于全书卷首，也唱在每一集电视剧前头。很好。好得很。当此“三国”各路英雄



市上流行的“新包装”

丁 聪作

活跃在黄金时间的千家万户之际，我看是该淘一淘了洗一洗了。再不要出现这种“群雄并起”的局面了，再不要出现这样的豺狼英雄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该与前现代的三国精神三国意识道一声“白白”啦，您！